

重读张志民抗战诗篇

马淑琴

张志民，1926年出生在宛平张家村（现门头沟区斋堂镇张家村）。‘宛平，地处‘京师’，历来是个风云聚集的地方。从记事起，家庭就生活在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中，耳边没断过枪炮声。可以说‘战争’是我的摇篮。”——张志民。

张志民12岁进入田寺抗日高小学习，成为抗战队伍中的一员。从“小鬼”起步，历任参谋、干事、队长、教员、指导员、教导员，练兵、打仗……也是从这时候起，他开始用子弹壳做的笔练习写诗。抗战多彩的生活，“常使自己产生一种不可抑制的情绪，行军、作战、反‘扫荡’，不管是怎样疲劳，也总要记下一点什么。偶尔发表在部队或地方的小报上。”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土地改革到新中国的诞生，从抗美援朝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直至“文革”特殊阶段的空白之后，张志民又一次掀起创作的高潮。他一生出版诗集、散文、小说、文论等60余部，特别是诗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特有贡献。他先后担任《北京文艺》主编、北京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诗刊》主编。

回首往事，张志民在《自题小照》中写道：“家住京西——山沟窄，/背包一打上五台，/扛的是枪，/揣的是爱！/风吹太行绿，/雪打燕山白。/已去的——/并不都是欢歌呀！/两鬓飞霜送往事，/半筐诗稿迎未来……”

艾芜先生称张志民“是诗林中的一棵大树，根深叶茂”。谢冕先生在怀念张志民的文章《那颗心还在跳动》中说：“京西一带山水壮丽辉煌，培养那里的人质朴、善良而又豪爽的性格。张志民的一颗诗心，就是百花山的精魂所熔铸。”张问吾先生这样评价：“张志民是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是他的人生道路、历史观念、文化性格和禀赋气质共同决定了他的诗歌的价值取向和艺术风格。”“他的个体生命一直与祖国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

张志民恰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了平西乃至晋察冀边区波澜壮阔的抗战历程，经历了抗战血与火的洗礼与考验，并且创作了大量抗战诗歌。有的诗歌是当时写就，有的是根据记忆记录、后来成诗。从宏大到细微，从场景再现到历史追忆，这些诗歌生动记述了晋察冀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军民团结齐抗战，用生命和热血与入侵之敌浴血奋战的动人篇章，而且诗歌语言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1937年8月，陕北洛川会议之后，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并开始在省际边缘创建抗日根据地。“边区”是抗战时期产生创造的、具有地理、历史和政治多重属性的词汇。晋察冀边区就是张志民熟悉并长期战斗生活的地域。其中，张志民的家乡平西及周边大都是山区，具有开展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张志民敏锐发现和体味“边区”和“山”紧密融合的关系，以及在抗战中生发的独特作用，并且提炼出其中的诗意，创作了千回百转、荡气回肠的180多行的长诗《边区的山》。他在诗中写道：“边区的山呵——母亲的山！/你喂养了多少好儿男！/严冬山草暖，/夏日泉水甜。/山山岭岭——练兵场呵；/村村镇镇——好营盘！/大路口，小村边，/榆树底下井台前，/多少人从这儿上前线，/多少人在这儿奔延安。”“边区的山呵——难忘的山，/山山岭岭情不断。/大娘做军鞋，/多情的针呵，/多情的线！/大嫂抬担架，/熬药的砂锅呵，/喂汤的碗！/……家家子弟兵，/村村是‘兵站’，/座座山头——顶天柱；/处处岩洞——火力点！/敌人的坟墓，/人民的家园，/边区的大山钢铁铸呵，/千难万苦——腰不弯！”

张志民是战士，也是诗人，对边区有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充满了诗意。这是多么亲切而又生动！这是细节，但这样的细节之中又蕴藏着震撼人心的宏大。张志民本身就是一名地道的“人民子弟兵和泥土”中这样写道：“边区好呵——好家乡，/边区的土呵——甜似糖，/边区的泥土真好呵，/什么样的良种它都长！/人民的战士，/祖国的儿郎，/他真爱那泥土呵。/为保卫边区的土地，/他给我们留下了/最后的一个形象：/滚燙的胸脯贴着边区的大地，/鲜红的热血浸入母亲的土壤……”

抗战文学是对抗战历史形象的生动记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曾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张志民对当年的晋察冀做了这样的诗意记述与解读：“在我们晋察冀，/一眼看百里，/透明的天，/透明的地，/走遍千山无迷路，/道道

溪水清见底！/叫声‘老乡’心相照，/一声同志成知己。/没带干粮，/那怕啥？/饭桌一摆炕头儿坐，/娃娃跑到你怀里……/在我们晋察冀，/人人得安居，/孤老有人帮，/弱小无人欺，/不知盗贼为何物？/日夜不拾遗！/从没打砸抢，/公堂无案理。/万颗心，/同对敌，/难怪只有除奸科，/不设警察局……”

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日战争都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人民战争。当年的八路军战士，大都是地区的“人民子弟兵”。宛平七区安家庄村村长李文斌组织的数百名地方抗日武装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大部分牺牲在支援冀东的战场上。斋堂地区还有“马栏排”“黄岭西排”等，因全排战士都来自同一个村，而用村的名字命名。张志民这样描写《人民子弟兵》：“子弟兵呵——人民的兵，/边区长呵边区生！/爬惯的山头走惯的路，/春去秋来乡土风。/村村后勤部，/家家联络兵，/杀敌归来家门过，/满街乡音唤小名！”好一个“春去秋来乡土风”，好一个“满街乡音唤小土风”，张志民用他精心提炼的诗句，把“人民子弟兵”的抗战置放于边区“春去秋来的乡土风”之中，并巧妙调用家乡方言“唤”字，写出刚结束战斗的子弟兵走过家门时与乡亲们握手相拥，乡亲们看着战后孩子们活着回来，满街乡音热烈地叫着乳名的场景。这是多么亲切而又生动！这是细节，但这样的细节之中又蕴藏着震撼人心的宏大。张志民本身就是一名地道的“人民子弟兵和泥土”中这样写道：“边区好呵——好家乡，/边区的土呵——甜似糖，/边区的泥土真好呵，/什么样的良种它都长！/人民的战士，/祖国的儿郎，/他真爱那泥土呵。/为保卫边区的土地，/他给我们留下了/最后的一个形象：/滚燙的胸脯贴着边区的大地，/鲜红的热血浸入母亲的土壤……”

抗战生活丰富多彩，张志民的抗战诗歌涉及抗战的方方面面。为了增强革命力量，将分散的小村利用各种形式凝聚在一起，共同对敌。张志民有一首诗名为《三个小村》：“三个小村一盘棋，/地委、专属，/军分区！/什么打扮都有啊！/分开来叫党、政、军、民，/合起来叫‘战斗集体’！/讲来往，/天天共朝夕，/论关系，/同志加兄弟。/遇上荒年，/树皮、谷糠共相济；/鬼子来了，/一个拳头同对敌。/人多地方窄，/房少更亲密。/真是千群一家呀！/吃黑米，/睡同席。/电话机旁，/奶奶剥麻嫂纺线，/办公桌下，/猫儿

打架鸡啄米……/春忙时节地头看，/地委书记背粪篓，/司令去拉犁……”

抗战环境艰苦，斗争残酷。张志民用诗歌记录了一场严冬时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鬼子的一场悲壮的遭遇战：“迎着风暴！/顶着雪花！/艰难啊！/大雪足有马腿深，/不像是走，/倒像是爬！/……”虽然枪拉不开栓，人下不了马，但遭遇战还是打响了。枪声不是我们的老套筒，而是鬼子的“马三八”。鬼子凭着武器精良先发制人。于是，“血泊浸着冰块，/冰块融着雪花，/按理说，/胜负已成定局。/不！/倒下的并不是战败者呀！/看那不屈的目光/依然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三个游击队员》则是用沉实的语言，讲述为保护游击队机密而牺牲的三个游击队员的故事。山村静夜，“闭眼能听到草叶儿响，/玉米棵儿拔节声。”“山野里，/古庙中……三棵明柱上/绑着三个/年轻的战士——/游击队的巡逻员！/……月光下/可以望见：/那撕碎的衣裳，/那带伤的脸孔。”面对鬼子的威逼利诱，“战士无言，/古刹无声”，直到“只见大佐，/在皮鞋上/擦着滴血的战刀，/明柱前/先倒下了/两位不屈的英雄。”第三个战士要求松绑，鬼子以为他会投降。松绑之后，战士高喊一声：“游击队员从来不出卖自己的军情！”“夜，凝成了铁块！/星，闭上了眼睛！/只见那年轻的战士/纵身冲出门外……”“为给游击队报警，/用他自己的生命/换得了那深夜的枪声……”

抗战期间，日军为实现军事控制、经济封锁、政治统治、情报压制等目的，设置了许多封锁线。抗战生活中，过封锁线是常有的事，夜过封锁线更增加了神秘感。张志民通过惟妙惟肖的诗句，让《夜过封锁线》充满了智慧与幽默。看似寂静的封锁线之夜，其实，封锁线的夜“没睡觉”。“‘太平’梆子不住地敲，/不住地敲呵——‘大大的好’！”这让人联想起抗战题材电影中，更夫一边敲梆子，一边高喊“平安无事啰！”的经典场景。其实，是“梆声点点作向导，/梆声之下千军过，/梆声之下人如潮。”“谷穗儿摇，/棉桃儿笑，/夸这滴《过路》演得好！/红高粱扭头瞧什么？/大路口上有‘名角’，/演‘伪军’的是侦察连的老刘，/扮更夫的是破路队的三小！/梆梆！梆梆！/三小的梆子手中敲，/咯咯，咯咯，/两人挤

到一堆儿笑。/一个指着梆子说：/‘放心过吧，咱这手里有护照’，/一个指着炮楼说：/‘后边还有一个连，/别让瞎驴出磨道！’”

还有反映军民鱼水情的《老奶奶和小哨兵》：“老奶奶说：/‘八十了，眼花了。’/小家伙说：/‘不花，/眼花了您哪能给我们补窗洞？/说什大的窟窿斗大的风……’”

《他们相爱了》写的是抗日队伍里，一个前线记者和一名军医的恋情。“她给他的/是第二次生命，/他给她的/是一本战地日记。/凝望，是他的请求，/浅笑，是她的默许。/等胜利以后，/共同的心声/是他们无语的约契。”他们都在战斗中牺牲了，“杜鹃是她的嫣红，/白杨是他的翠绿……/一个二十三，/一个二十四，/永远是他们的年纪。”

“别让瞎驴出磨道”“针大的窟窿斗大的风”以及“嘎咕”“石塘”“扎野”等张志民抗战诗歌中的诸多语言，都是从京西山村的泥土里长出来的“活”的语言，有的甚至是地区特有的。张志民信手拈来，准确运用，不仅使诗的形象、意境更加鲜活生动，而且充满了地域的温暖与亲情。张志民在《张志民诗选》（后记）中说：“我生长在农村，战斗在农村……这些诗，还反映了一点当时的斗争生活，可以闻到一点农村的气息。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在生活之中，自己身上就带着那大地的泥土。”

张志民的诗歌很好地继承了古典诗歌传统，早期的诗歌带有鲜明的民歌特性，语言俗中有雅，赋予民间传统崭新的内容。抗战诗歌中包含了诸多叙事——这是记述抗战历史的重要性决定的——并将叙事与抒情做了完美的结合。诗歌语言通俗易懂，自然洒脱，灵动鲜活，在口语流畅恰切的表达中，承载着思想与精神的高度。张问吾先生在《诗与大地共长存》评论中说：“志民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个性。他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他的诗构思新颖、意象灵妙、音韵和谐、节奏鲜明。他有极好驾驭语言的功力，那些灵动的诗句仿佛自然天成，在质朴凝练中蕴涵着惊诧与绮丽。”

张志民是极力将诗歌引向大众化的诗人，用他的话说，是“粗通文墨的人”都能读懂。谢冕先生在《那颗心还在跳动》中说：“张志民最初的创作，采用民间歌谣

的方式，创造了中国新诗的新生面。在新诗普遍性的欧化传统的另一面，特别是从农民歌谣的方式中，他提取并创造了贴近中国广大农民熟悉的诗歌形态。”“在他素朴的表达中，有着相当的‘俗中之雅’。细心的读者都能从他的那些适于吟诵的诗行中，感受到他高度锤炼的功夫，感受到他那高超而娴熟的诗艺。张志民从他处身民众的土壤中，吮吸着大地的精华，也吮吸着大地之心子灵深处的丰富和充实。他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恒久的。”

抗战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张志民的抗战诗歌以准确、生动、形象的叙事和真挚、自然的抒情，记录了抗日战争的艰苦历程与波澜壮阔、讴歌和弘扬了革命的英雄主义与民族精神；奠定了抗战文学的红色基因和光荣传统；创造了具有中国气派的生动鲜活的抗战诗歌叙事模式；发挥了守护中华民族文心、凝聚民族力量、弘扬抗战精神、宣传和鼓舞群众、凝聚和激励人心、激发抗战斗志的作用。并且以诗的艺术形式留下了真实深刻的历史记忆，犹如用诗歌竖起一座抗战纪念碑。

2015年8月20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北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作家协会、中共门头沟区委宣传部在张志民的家乡联合举办了一场张志民诗歌创作研讨活动。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作协主席刘恒，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吴思敬，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王升山，门头沟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区作协等部门领导和张志民亲属出席。18位专家学者从抗战等不同角度对张志民诗歌进行了深入研讨。活动之后，吴思敬老师领衔主编、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张志民诗歌研究论集——《诗林中的一棵大树》。

在“七一”即将到来之际，我们重读张志民的抗战诗篇，学习、弘扬和传承他始终将自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坚持艺术为人民大众的精神品质，具有更加不同凡响的重要意义。这将鼓舞我们继续高擎民族精神的火炬，继承和发扬张志民等老一辈优秀作家和诗人的光荣传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努力。

斋堂川抗战歌谣

李德禄

巍巍太行山，滔滔永定河。纵横幽燕的平西境内，山高林密，层峦叠嶂，是京城通往塞外的通衢要道。“斋堂川”是平西的核心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斋堂川”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指从清水河的发源地灵山、百花山至清水河汇入永定河的青白口一带；广义则是泛指门头沟西北部山区，包括清水镇、斋堂镇、雁翅镇、王平镇、大台办事处以及北岭地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将战火蔓延到平西。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在斋堂川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斋堂川的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1938年春，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平西，创建了抗日斗争根据地。八路军指战员与众多抗日武装相互配合，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抗日篇章。同年7月，八路军第四纵队从斋堂川杀出，四路奇袭日寇盘踞的北平城，捣毁了鬼子电力中枢，给了狂妄嚣张的日寇以沉重打击，让民众看到了抗战必胜的曙光。

冀热察挺进军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粉碎日寇五路“围剿”，十路围攻，成为斋堂川抗战的中流砥柱。八路军干部罗立斌在纷飞的战火中创作了《挺进军歌》：“挺进！挺进！在卢沟桥畔，在永定河边，在敌人的远后方，在祖国的最前线，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配合东北义勇军的胜利，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创造冀热察新的根据地！我们的旗

帜飘扬在长城外，我们的斗争震动了全世界！挺进！挺进！要消灭日寇，打到鸭绿江边！”这首催人奋进的《挺进军歌》是战斗的号角，化作斋堂川人民抗日斗争的呐喊，呈现出全民皆兵、全民抗战的壮烈场面。1939年前后，抗日军民在抗日的烽火岁月里创作了大量抗战歌谣，其内容主要聚焦了三大主题。

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有一首歌谣名叫《小日本》：“小日本，太疯狂，又抢衣，又抢粮，又杀人，又烧房，简直就是狗豺狼。我们赶快扛起枪，保卫中华保家乡。”再如：“东洋鬼子太凶残，烧杀抢掠到咱川。百姓心中怒火燃，齐心抗日把身翻。”这些歌谣直接声讨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表达了人民团结抗战、“齐心抗日把身翻”的决心。

激励人民奋起反抗：例如：“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刀和枪，走出矿山、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再如：“窗外太阳红，门前流水清。壮士上前线，杀敌多英雄。丈夫去当兵，妻子也光荣。送你上前线，多杀鬼子兵。”这些歌谣激励着京西人民的抗战斗志。百里斋堂川的广大群众纷纷行动起来，父亲送儿去当兵，妻子送郎上战场，京西无数的热血男儿就是唱着这样的歌谣走上了抗日的战场。《抗战歌》是一首儿童励志的歌谣：“中国不待亡，我们正成长，再等几年后，即可上战场。”表达了少年儿童抗日的决心。

宣传歌颂抗日英雄：“八路

军啊真勇敢，保家卫国冲在前。枪林弹雨不畏惧，杀敌立功美名传。”歌谣讲述了一位挺进军的八路军战士，他身体多处受伤仍坚持战斗，与敌人展开肉搏，消灭了多个敌人后壮烈牺牲。一次，游击队准备袭击敌人据点，有些初次参加战斗的游击队员心里难免紧张，行动表现出犹豫迟疑。老游击队员给他们讲述了那位八路军战士的故事，使初次参加战斗的队员受到鼓舞，果敢地参加战斗，不但消灭了敌人，还缴获了武器弹药。《煽大缸》是一首真实反映游击队战斗生活的歌谣：“煽盆煽碗煽大缸，游击队员化了装。走东庄，串西庄，腰里掖着盒子枪。盒子枪，真有准，一枪打死小日本。小日本，一哄吹，你还能活几天？小日本，害了怕，夹着尾巴滚回家。”

这些歌谣简洁明快，通俗易懂，乐观豪迈，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传递着人民抗日的决心，体现了人们对抗战胜利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些歌谣的激励下，斋堂川里的男人争先恐后地参军上战场，妇女做军鞋、送情报，儿童站岗放哨，老人照顾伤员，人人努力争先，为抗战做贡献。斋堂川里，先后有3946名青年参加革命队伍，1476名宛平山区优秀青年告别亲人，奔赴全国的抗日战争。有829名干部战士在抗日战场上壮烈牺牲，850人光荣负伤致残。京西儿女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将军创作了许多

抗战诗歌，例如：“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放眼冀热察，前程不可量。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虽持久，笑我力正壮。”这不仅抒发了他的革命情怀，也成为激励军民抗战的重要精神武器。在京西这片锻造民族魂魄的土地上，萧克、邓华、宋时轮、杨成武等60位将军曾在这里战斗生活过，京西至今仍传颂着他们传奇的故事。

战争是残酷的，记载着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1941年9月初的一天，日本军官船木健次郎带领日本兵，打着参观学生运动会的名义，将附近的齐家庄、张家庄、塔河、梁家铺等村庄的数百名群众强行驱赶到杜家庄小学操场实施放毒气，致使400多人中毒，其恶行丧尽天良，罄竹难书。1942年，日寇在斋堂地区大搞“并村”，制造“无人区”，妄图割断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斋堂镇的北山上，有一个40多户人家的村子叫王家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村里年轻的男人都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妇女为八路军做军衣、军鞋，儿童参加儿童团，成为平西抗日的堡垒村。王家山的抗日行动成了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942年12月12日黎明时分，斋堂据点的日本中队长赖野带领日伪军，在汉奸宋福增的带领下，悄悄包围了王家山村。放哨的民兵王文志发现敌情立刻开枪报警，来不及转移的老弱妇孺不幸落入敌手。

日军和伪军将他们围住，逼问游击队哪里去了、粮食藏在什么地方。乡亲们对敌人横眉冷对，没有一人回答。汉奸宋福增见众人不说话，用勺子舀起滚烫的玉米粥，一边往人群里泼，一边大骂宋福增丧尽天良，忘了祖宗。恼羞成怒的鬼子把乡亲们关进不足20平方米的两间小屋里，屋外架起机枪，再三逼问，仍无人回答。气急败坏的鬼子用铁丝网把房门绑上，点燃整捆的玉米秸，从窗户扔进屋内。顷刻间，屋内燃起熊熊烈火，妇女儿童发出凄惨的叫声。有的人拼死爬上窗口，被罪恶的子弹击落，倒在血泊里。屋子里共有42名乡亲，其中包含6名孕妇和刚满月的孩子，全部丧生火海，王家山村的17户人家自此绝根断代。

王家山村地处高山，交通闭塞，这里的村民没有多少文化，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大山。但是，当他们面对日本鬼子黑洞洞的枪口，面对熊熊烈火，宁愿被打死被烧死，也绝不当汉奸，绝不丢掉民族气节。《晋察冀日报》三次刊文揭露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平西人民义愤填膺，青壮年纷纷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向日本侵略者讨还血债。王家山村的青壮年组织起游击队，他们一律穿白鞋，人称“白鞋复仇队”。

“冷风呀，吹来呀，阵阵寒哪唉，姐在房中做针线，两眼泪不

干那。哎哟哟，一阵好心酸那。兄弟呀，姐妹呀，听我言那哎，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鬼子到了王家山那。哎哟哟，百姓们遭了难那……兄弟呀，姐妹呀，莫悲伤那哎，团结起来齐抗战，消灭鬼子和汉奸那。哎哟哟，为死者报仇怨那。”著名的抗战歌谣《王家山小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是王家山惨案后斋堂川人民集体创作的。歌词常见版本共有9段，以叙事方式控诉和声讨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罪行，反映了斋堂川抗日军民的悲痛和不屈精神。罪恶者必诛，制造王家山惨案的刽子手们最终也没能逃过正义的审判。1943年，驻斋堂据点的日军中队长赖野在河北滦水县被八路军击毙；汉奸宋福增尽管四处藏匿，终难逃法网，于1951年经人民审判后被枪决；船木健次郎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为牢记历史，不忘国耻，当地政府为殉难者镌刻墓碑，北京市人民政府将王家山惨案发生地公布为“国耻纪念馆”。

历史并没有完结，和平需要正义力量来维护。斋堂川老区的学校仍在教授这些抗战歌谣，仍在讲述老区人民浴血奋战的抗战故事，斋堂川的上空仍飘荡着抗战歌谣的旋律。抗战歌谣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创作的文化瑰宝，通过代代传唱，将过去与现在紧密连接起来，让青少年铭记历史。这些抗战歌谣不仅成为当时抗日斗争有力的武器之一，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批判。